

中国财经经典系列



中华逸事 西周古鼎铭记 赋税史



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

吴才麟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财经经典系列

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

吴才麟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 / 吴才麟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095 - 6664 - 0

I. ①史… II. ①吴… III. ①原始社会 - 财政分配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12.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101 号

责任编辑: 杨 静 杜 剑

责任校对: 刘 靖

封面设计: 思梵星尚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010 - 640334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34.75 印张 494 000 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664 - 0 / F · 536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11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0492、QQ: 634579818

序 言



吴才麟研究员是历史专业人员出身，工作中自学而学得财税理论以后，被重视人才的财政部领导安排从嘉兴税务所调到财政部。在熟悉古代财税知识基础上，吴才麟得知财政起源课题可能古今中外还无人研究，他就拜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甲骨文专家和文字学、宗教学等方面专家为师，经当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领导批准：“专门研究财政起源”。从1980年开始，他在夫人的全力支持下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跟随民族学、考古学等专业的同志，常年奔波在边陲野外及山区，搜集与原始社会相关的史料，往往一次要经过几个月的野外艰辛。返京整理材料时，人瘦了一二十斤，真是称得上痴迷和拼搏。

吴才麟认为，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他以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引起生产关系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为主线，力求从揭示人们对生活物质资料的各种支配方式入手，来形成由浅入深的认识。

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生产工具从石刀、石斧、尖状器、砍砸器进步到“距今二万八千多年前，我国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打制的石箭头”^①，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②。因为弓箭应用于生产，在“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③的时代，打到的野兽增多，有时吃不完。此时开

① 《考古》，1976年第3期，第159页。

② 《考古》，1976年第3期，第157页。

③ 《韩非子·五蠹篇》。



始，人类逐渐进入有剩余产品而可探索开拓种植经济的时代。再后来，种植谷类植物的经验积累，掘木棍、木耒，木耜、骨耜等农具发明出来，初期的种植经济渐次进化到刀耕火种农业经济及耜耕农业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兄弟姐妹互为婚姻的辈婚向族外婚进步，每个社会成员都在母权制家庭公社里过着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生活。当生产力再发展到穿孔装柄的石锄、骨锄和蚌镰及制陶、原始纺织工具出现，社会进入锄耕农业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男子成了主要生产者，生活物质资料比过去大有增加，族外对偶婚向夫妻制过渡，个体家庭从家庭公社中分化出来，私有制渐趋盛行，社会矛盾激增，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流行数万年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的风俗瓦解。与此同时，族长、酋长组织生产、指挥作战的崇高威望向统治权力演化，进而出现强占优质耕地为己有。影响波及，耕地私有渐成风俗，伴之而起的是私有意识及其行为泛滥，当年因为成文法律未曾出现，造成掠夺财产战争的暴力分配风俗四处蔓延。

与之相应，人类的社会组织机构，也由胞族、氏族扩大到部落。就在这个部落时代后期，“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①。掠夺财产战争的残酷性导致姻亲关系的部落组成联盟。又因为部落及其联盟的日常内外事务与日俱增，在生活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脱离物质生产的公职人员得以不断增加。吴才麟当年在攸乐大山的基诺族住地，目睹部落时代面积几十亩的公有地时，当事老人告知：公有地由全部落成员义务耕作，收获物全部交给酋长支配。当年整个部落所有的公共收入和支出，全部靠公有地……山民寡言而言简意赅，遥想当年而对照现代，那时的公共收支内容，即是后来国家财政的胚胎！这种原始财政的遗迹从“活化石”中“抢救性挖掘”出来而上升为学理认识，对于学科建设发展是十分宝贵的。也因为暴力分配时代的战争残暴与频仍，为了增强实力克敌制胜，平日关系友好的部落联盟间再行联合，于是出现了地域性的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落联盟。其公有地面积，在部落联盟数百亩的基础上，扩大到数千亩^①。

时近金属时代前夜，生产力水平提高到劳动力参加生产能够提供剩余产品而引起战争胜利一方对劳动力前所未有的重视，把原先要处死的战俘罚作奴隶投入生产，公有地上的收获物，全部可供统治者支配。于是，引出阶级国家的雏形，实质上国家就是地域性联盟的继续和发展。“王畿千里”的“公有地”及“千斯仓、万斯仓”的收入，就是从部落时代以几十亩的公有地为基础的原始财政分配关系发展而来的。

粗线条述及这本书作者所研究撰写的国家财政起源梗概，是基于多年潜心钻研而依照历史唯物论原理把基于剩余产品和公共需要的原始社会公共财政，到进入阶级国家社会而形成国家财政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学术规范达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表达，难能可贵。

20世纪90年代，在我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后公开发表为《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专著）时，就高度重视吴才麟研究员这一独树一帜、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从中汲取了我提出财政基础理论层面“社会集中分配论”的重要营养，并促使我形成了“原始公共财政——国家财政——公共财政”的“否定之否定”通识式财政发展观。值此吴才麟研究员心血凝结之成果《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再版之际，特为之序，深信此书必成为中国财政学家研究成果中的一部传世之作。

贾 康

2016年7月18日

^① 甘肃省南部的拉卜楞寺，类似史前的地域性部落联盟，新中国成立之前直属布达拉宫管辖，公有地4518亩。

自序一^①



一

书名中有“史前”二字，根据史学界的一般解释：史前，是历史科学中的术语，系指文明社会形成以前的历史。所以，史前经济，即是国家形成以前的原始社会经济。

二

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首要的前提，无疑是人类如何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马克思说：“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②。由此可见，物质资料的生产，首先是生产工具的生产是决定性的前提，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而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

① 自序一为本书1990年版序言。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32页。



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所以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所以“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同以往的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牢牢地置于自然的、唯物的辩证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真正的历史是从思辨终止的地方开始。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这样，他们就超出了以往的一切思想家，从而科学地把唯物主义用于研究历史和社会。

人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生产活动而区别于动物。因为动物不能变革自然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动物只能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现成东西维持生存，而人却能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自身生活的物质条件，通过变革自然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通过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就越来越摆脱自然对人的统治。所以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改造着自己。所以考察历史必须以生产的关系为起点，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前提。“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③。”因此人类社会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8页。



及其关系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演进的。我们在这本书中，紧紧把握住这一点，按照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顺序，展开研究。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曾经又相继出现过如下多种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分配关系。

与不会制造劳动工具的情况相适应，那是一种纯粹的采集经济；

与石刀、木棒等工具相适应，是狩猎经济；

与简陋的复合工具相适应，是渔猎经济；

与弓箭工具相适应，形成了种植经济；

与掘木棍农具相适应，出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经济；

与耒耜农具相适应，形成耒耜农业经济；

与锄的农具相适应，形成锄耕农业经济；

当金石并用的时代到来，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才逐渐被奴隶制经济形态所取代。

在纯粹的采集经济时代，人类还处在“半动物”状态，仅凭祖先的生存本能，巢居而群处，过着“抢吃食物”的乱婚生活。

在狩猎经济时代，几乎所有会动、会爬、会跳、会飞的虫类、贝类和四足而毛的动物（主要是小动物），都成了人类的食物。在血缘家庭中，人们过着“分吃食物”的群婚生活。

在渔猎经济时代，人类的食物扩大到鱼类，食物的来源增加，母系氏族制度随之而产生。在氏族外婚制的作用下，原始的食物分配风俗逐步形成起来。兄弟姐妹互为婚姻，人们过着辈婚生活。

到了弓箭应用于生产，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比以前大有加强，有时猎获物消耗不完，开始把性情温和的动物或幼崽养起来。于是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为了驯养动物而种植谷类等作物，所以种植经济应运而生。

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上，社会产品分成了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两大部分。必要产品用于生产者自身的再生产，其分配属于社会产品的一般分配，或称分配一般。这一时期的一般分配，已经实行共同劳动，平均



分配的初期形式，表现为生产者多吃。这种形式也是从渔猎经济时代的原始分配形式演进来的。剩余产品用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的物质消费，其分配属于社会产品的公共分配。它是在这一时代刚刚发生的。虽则公共分配初起之时，受生产条件的制约，不仅相隔数年才能举行一次，其内容也极其简单。但是，这种极其简单的公共分配内容，即是后代财政分配的因素。易言之，全新世后期随着国家形成而形成的国家财政分配关系，它的最终源头，即是初起之时的公共分配内容。

火耕农业经济形成，人们有了比较稳定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源，人口增长起来，氏族也向胞族和部落发展，母权制登峰造极，就必要产品的一般分配而言，每一基层单位的生产者，要将收获物如数上缴给母系家长支配，所有社会成员，在母系家长的领导下，都按平均主义原则，对生活物质资料进行分配和消费。就剩余产品的公共分配而言，由于剩余产品的数量有所增多，加上定居生活和部落形成，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及其物质消费，每年都有基本固定的日子，并且已经越出了氏族和胞族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部落都有公有地出现，由部落成员无偿耕种，收入归部落酋长支配。这种事情，在以前的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就其性质及其形式分析，它就是后来财政分配关系的胚胎。

到了耜耕经济时代，男子渐成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父权崛起而母权开始瓦解，族外群婚制被对偶婚代替，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形式又得到了发展，产生了酋长、族长对物质生活资料多吃和多占行为，突破了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则。

随着父权崛起，母权开始瓦解，特别是农业生产经验的长期积累，人们逐步认识到地理环境好坏是生产丰歉的重要条件，争夺部族领地的斗争越演越剧烈。于是各个姻亲部落为了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而组合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出现后，一方面，家长、酋长因组织生产等需要所形成的权威，在战争中逐步向统治权力转变；另一方面，他们是社会各种公共事务活动及其物质消耗的组织者和支配者，他们借着公共活动需要开始脱离物质资料生产，成了常设的公职人员。这致使社会公共事务活动的内容不断增加，特别是大的祭祀仪式趋向复杂化，导致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在统治权力支配下的公共分配形式开始萌芽。联盟酋长的经



济来源，就是公有地上的无偿收获。

锄耕农业经济的出现，畜牧业和制陶业随之而发展，农业经济在社会物质生活中更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随葬品的墓葬、墓数和储藏粮食的窖穴数量、容积等情况分析，社会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相当一部分家庭，已经常年都有剩余产品存在。

个体家庭不断从父系家庭公社中分化出来，变成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导致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血缘纽带渐渐松弛，以地缘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农村公社由此而产生。

各个基层生产单位的耕地，来源于农村公社的定期分配。生产者习惯于几户劳动力共同生产，对劳动成果按户数平均分配。这是这个历史时期一般分配形式的显著特点。它与母系氏族公社内部成员平均消费收获物的风俗有了不同的性质。它有利于贫富分化和私有制发展。尤其是酋长凭借权力占有好地不放，影响波及，各家住房前后和村寨附近的零星土地，也就逐渐变成了基本生产单位的私有财产。趁着部分土地成为私有的对象，酋长们进一步强占大片耕地私有，并据此取得比一般家庭有较多的经济收入，从而使一些剥削行为的物质基础萌芽并且渐成制度。

锄耕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增多，部落及其联盟之间杀人掠夺财产战争，曾经成了野蛮人的“正常职业”。所以这一时代的公共分配形式，多带有暴力分配的性质和特点。

各个部落联盟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和免遭强敌洗劫，相互间进行联合，于是比原先部落联盟的规模更大的地域性联盟即此创立，进而导致公共活动的内容日渐增多，形式也越加复杂，与之相应，常设的公职人员亦随之而增加起来。

因公职人员日常生活和祭祀、打仗等耗资需要，地域联盟和部落组织，都把村寨近处的肥沃耕地辟作公有地，由全体生产者集体无偿耕种，其收获物交公共仓库由酋长支配，作为部落联盟和地域联盟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

固然这个时期公共分配的收支数额尚还不大，但社会公共事务活动需要物质消费的内容和现象，已经无法中断。不但如此，后来国家形成



时期的财政收支形式和内容，就是它的继续和发展。

金石并用时代到来，家长奴隶制向奴隶占有制转变，个体家庭普遍脱离氏族公社自立门户，耕地的相当部分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军事首领在杀人掠夺财产的战争中，统治权力日益强化，把部分战俘罚作奴隶，正好为统治者霸占的大量土地，提供了劳动力。这种社会风俗的兴起，以及不断的流行和强化，进而又导致了私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乃至造成了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因类似后代法纪的风俗日渐盛行，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通过政治的统治权力作用，把社会成员分成不同等级为基础，终于萌发并形成了人对人的剥削制度。

在剥削行为形成制度的同时，公共分配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因地域联盟间的掠夺战争延绵不绝，致使庞大地域性联盟创立。这种社会最高组织机构，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就必须设置强制机关，加上大规模的战争和祭祀活动，都需要经常性的大量经费支出，因此，这种组织机构无偿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是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符合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

鉴于庞大地域性联盟等机构，都是社会的职能部门，其本身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因此，它要经常又无偿地获取大量的经济收入，在奴隶制初起的年代只能凭借权力，占有更大面积的耕地，再把大批战俘罚作奴隶，强迫他们在这些土地上服劳役，才能取得大量的收获物。以此维持各个职能部门正常运转。

当物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原始社会经济形态被奴隶制经济形态所取代，庞大的地域性联盟机构，也渐渐演变为国家机器。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被俘的奴隶服从政权代表者的命令，长年在公田上服劳役可以免遭杀戮；一般社会成员安排一定的时间，为公有地无偿耕种，收获物交到公共仓库，可以换取自己和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两者的需要与可能相互结合，政权的代表者成了规模宏大、内容复杂的公共分配的主体，于是地域性联盟的公共分配，逐步演变成为国家财政分配关系。因此，我们把这个历史范畴内的公共分配，称之为国家财政比较合适。于是联盟时期的公共分配形式，是国家财政分配关系的雏形，而国家财政分配关系的形式，是联盟时期公共分配形式发展之必然。

自序二



《史前经济与财政起源》1990年出版以来，同行和朋友给我提过许多宝贵意见，今天能有机会再版，首先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对全力支持我进京研究财政起源30余年，独自抚养子女成家立业而积劳离世的张坤鸣夫人，致以沉痛的悼念！没有她的鼎力相助，不可能有这本书与大家见面。

二

1978年，受祖国税务泰斗王诚尧老师推荐，我从嘉兴税务所直接调到财政部。在北京图书馆，一次偶然想法：财政到底怎么产生的？但找遍目录一无所见。后来与考古专家闲聊得悉，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当年建立国家的民族已经不复存在；巴比伦即现在的伊拉克一带，兵荒马乱不止，难为科学研究；印度，文化古老而科技先进，惜熟悉古史乏人，其古代历史书作者是中国人；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没有断层，但自古以来史学家研究财政不多，财政专家研究历史也少。忆当年财政泰斗许毅老师对我说，研究财政起源非你莫属！

1979年着手整理旧日抄录的相关材料，紧接着拜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和甲骨文专家为师，远赴云南、西藏、福建、甘肃、黑



龙江等地四处奔波。经常与交通极度闭塞的山区农夫为伍，了解到他们解放初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虽然物质生活条件确实十分艰苦，而原始财政的素材非常丰富，我在攸乐大山深处的基诺族，曾经目睹原始财政的残痕遗迹，并且为之激动得泪眼模糊！

诚然，常年跋涉在人烟稀少的野外，有时大山上面叠小山，高山前面又是山，峰回路转疑无路，林暗花明还是山。傣族竹楼建在小溪畔，远眺近观风景都很美，但竹楼下面养着牛、猪、狗、鸡，楼上的蚊子、苍蝇成群乱飞……有时候这个村到那个寨，一天走不到，中途要住救命房。这种所谓房子，四周乱石叠成墙，顶上横着原木，夜间不少野兽就游憩在周围。有些路边草比人高，毒蛇昂首待物，有的山野饿虎张着铁爪，碰得不巧，被毒蚊叮咬了，外地人会发恶性疟疾不得了！新华社一位同行去搞摄影，欲保留原始社会的祖先不穿衣裤等历史画面，不幸性命丢在去独龙族的山路上面。

三

任何事物的产生，往往有一个演变过程。例如日常见到的汽车，它是有关仓库的原材料，经过许多道工序加工再装配而成的。虽然这样说也不能讲是错的，但不完整。因为有关仓库的材料，都是相关矿石冶炼出来的。所以应该说，汽车是各种有关矿石冶炼成材料，再把这些材料进行复杂的加工制造出来的比较妥当些。财政分配关系也是这样，它不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因为国家形成以前，早就有政权的代表者，凭借政治权力，支配一部分物化劳动或劳役的史实存在。

财政不是从来就有的事物，它形成的时间很长，渗透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生产方式之间。

当生产力发展到种植经济社会，剩余产品开始出现，以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为原则的母权制登峰造极，族外群婚向对偶婚过渡，氏族胞族向部落发展。偶然的的机会，几个家庭公社成员聚集到一块，大家兴高采烈，自愿拿出所有的剩余食物，由某一家长临时统一支配，达到全体成员娱乐高兴的目的。于是开始出现了公共支配。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一二



万年之前。当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种植经济被火耕农业经济取代，剩余产品增多，部落组织成为母系氏族公社的靠山，公共活动及其分配机会逐步增多起来，就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出现了基本定时和定量的公共经济的来源。

作者在云南攸乐大山的基诺族住地，亲眼看到千金难买的古代原始财政遗迹。当年当地的大爷陪着我说“依洛若寨的人，以前都住在这里。这种地方都是各家的房子（草棚），那边和那边，那么大的地方全都是当年的部落公有地，每个农时节令到来，全寨的劳动力都要到公有地上干活。秋收季节到了，大伙把公有地上的谷子，全部送进酋长的仓库，然后才可以到各人自己的地里干活，这几块公有地全部加总起来大概有几十亩”，“酋长也和他们家人一起干活。不过，酋长干活的时间不是很多的”^①。

“寨子里家长碰头（开会）有的时候都在酋长家里吃饭，酋长有的时候还杀鸡。推毛切（过新年）的时候，整个夜里全寨人吃的那么多东西，多是酋长家拿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山下汉人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寨和那边寨联起来抵抗，还买了枪，那边好几个寨，人也多，公有地有好多块，总面积比这里大多了”^②。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火耕农业经济时代，社会上已经有部落组织，部落酋长还未曾脱产，而部落已经有几十亩公有地了，公有地的收获物属于酋长支配。这就是原始财政的部落分配。

距今大约六千年前，社会已经发展到耜耕农业经济阶段，对偶婚开始向夫妻制过渡，个体家庭开始从家庭公社中独立出来，私有制得到发展，社会矛盾日渐增多和激化，部落之间出现斗争。为了增强实力，平时比较友好的部落，相互组合为联盟，联盟公有地总面积比部落时期“大多了”（遗憾的是腰资老人可能没有面积“亩”的概念，在座的青年人认为几百亩没有问题。作者注）。基本可以肯定，部落联盟公共分配的数量也随之而比部落“大多了”。于是出现了由公职人员掌握的联

① 摘自1981年2月7日，作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攸乐大山的依洛若寨，与基诺族阿车若、腰资的谈话记录。

② 同上。



盟分配。

当生产力继续发展，石锄和中耕农具普及，每个劳动力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加上对偶婚被一夫一妻制取代，大部分耕地属于个体家庭私有，生活物质资料较多地被人创造出来，从而增加了人们的私有观念，导致“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获取财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①。由于掠夺财产战争异常残酷，从新中国成立前佤族情况看，被打败联盟的所有财产全部被抢光，整个寨子夷为平地，男女老少几乎被杀完。部落联盟为了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安全，增强自己实力，客观上必须与周围有姻亲关系的联盟联合，因此，地域性部落联盟，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来。

从民族学材料分析，新中国成立前拉卜楞寺这个政教合一的权力机关，它的公有地面积扩大到4518亩，从现在的史料可看到地域联盟公共分配的数量已经十分可观，脱产人员数以百计，内设九大官员。似是古代地域性联盟机构的翻版。

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青铜器出现，我国历史跨入金属时代。由于锄耕农业经济兴起，人的劳动有了剩余价值。与过去比较，奴隶数量增加，与此同时，较多的物质资料呈现于社会，造成人们私有意识泛滥，于是“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因此，出现了公共分配的特殊形式——暴力分配。从民族学材料获悉，新中国成立前西藏地区僜人社会，有的地方类似这个历史的发展阶段。有些蛮横残暴的首长，被几个姓的人联合杀死；有些威望高又办事公正的首长，干活有人帮说话有人听，渐渐成为“天下的首领”。在这个历史时期，为了壮大实力，地域性联盟再互相联合，公职人员各司其职，刑罚标准公开，治安手段强化，一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生活安定的庞大地域性联盟的政权，渐渐地在杀人掠夺财产的暴力分配环境中建立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规律所至，也是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之必然。与之相应，维持这个政权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即“王畿千里”的公有地，也随之而确立。可见维持政府日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运转的经济来源“公有地”，从部落几十亩，到联盟几百亩，再到地域联盟几千亩、国家创建时达到“王畿千里”，都是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而逐渐形成起来的。

追根究底，财政分配关系植根于公共分配。我国种植经济时代萌芽的原始公共分配，既是后代公共分配的鼻祖，也是国家财政分配关系的胚胎，距离现在的时间，大概超过一万年！而整个公共分配发展的具体内容，都贯穿在四十多万字的全书之中。